

博士文库

重庆三峡学院三峡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成果

明清 《夔州府志》 与夔州社会文化史研究

熊茂松 / 著



序



熊茂松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夔州府志〉与夔州社会文化史研究》就要正式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我带过的博士研究生近年来纷纷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看着这些学生不断成长，都在各自的高校中成为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更是一件开心的事。

熊茂松硕士一毕业就与我联系，说要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我非常乐意。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先到大学工作了，担任学校科研管理工作，在工作中增长了见识，再来读博士，就显得更为成熟，这样的工作也在无形中增强了他的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对历史文化问题的认识能力，所以等他考上博士后，我对他的科研能力已是非常放心了。

熊茂松在重庆三峡学院工作期间，读博士之前就积极地参加重庆的地方史及地方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这也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夔州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尤其在明清两代更具有特别的价值与地位。而熊茂松工作的大学正好属于古代夔州地区，所以他特别关注夔州地方史及其历史文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研究的是历史文献学，一直强调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应在历史文献学的基础上向史学的专题研究发展，不能仅限于对一两种历史文献做些外围的梳理工作。熊茂松的博士论文以明清两代的《夔州府志》为基础，先把相关的历史文献的情况研究清楚，再以此为基础研究《夔州府志》中有关地方历史与文



化的专题，就正符合我的愿望。这样的研究，既有历史文献学的专业特色，又有史学研究的宏观视野，在我看来，是历史文献学得其所用的最好方式。

通观这部著作，正是体现了这种研究的特色。作者在上编研究夔州方志的编纂源流，从夔州行政区划的演变，到夔州多种方志的修纂变迁，再到清代全国性的《一统志》以及全省性的《四川通志》与《夔州府志》的修纂关系，能从历史文献学的视野对夔州方志的修纂史做完整的梳理，这一部分的研究能把夔州方志的修纂放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找出其中的传承关系，以及在方志修纂体例上的变化与完善情况，并与全省与全国的方志的修纂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和观察，这样就能使人们对于夔州方志的修纂情况获得较为宏观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夔州府志》的具体内容奠定坚实而广博的基础。

作者把《夔州府志》修纂的历史背景研究清楚之后，又对《夔州府志》的具体修纂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古代是如何修纂一部体例完善的方志的。他从府志修纂人员的素质与志书质量的关系入手，研究府志修纂成功的关键所在，并且仔细区分了修纂人员的类别，由此看出古代修纂方志所涉及的各种人员，这与今天的方志编纂是有所不同的，从中可以进行借鉴与对照。

更重要的是他研究了清代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修志思想，这也是研究古代方志修纂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他认为，清代的方志修纂分为历史派与地理派，两派具有不同的修志思想，对方志的修纂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再来分析《夔州府志》的修志思想，就显得源流清晰，重点突出，特色显著。这样的研究，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夔州府志》的研究，更对清代各地方志的修纂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我们就能看出清代修纂方志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之后他又研究了《夔州府志》的史料来源，分为纸质文献的来源（包括明清两代的相关著作）和金石文献的来源两大类型。其梳理非常细致，对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巫山、云阳等县的金石史料都做了梳理，这无形中就成了古代夔州地区金石史料的一个全面总结，由此亦可看出古人重视各种文献资料以用于修纂方志的特点与传统。

以上还是对《夔州府志》相关史料的整体分析，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又

对《夔州府志》中的特色史料加以重点的梳理与分析，包括白莲教史料、竹枝词史料、人物史料三种类型，可以说这些都是《夔州府志》与其他地区的方志相比而更具地方特色的史料。对此类史料进行专门的分析与研究，不仅对夔州地方史及其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对整个清代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更能促进对于清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的深化。

对于《夔州府志》的文献学研究上编已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与特点，下编则以此为基础，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夔州府志》所反映的地方历史与文化的若干专题。这包括明代夔州地区社会与生态变迁问题、清代前中期夔州及附近地区的开发与玉米种植问题、明清时期夔州地区的水利建设问题、夔州地区的文化习俗问题、清代夔州地区政治与社会生态问题以及白莲教起义问题，这些专门性的史学问题，只有在认真整理研究了《夔州府志》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之后才有可能提出并展开研究，并且可以根据《夔州府志》所提供的翔实史料加以分析论述。

所以我一再强调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必须采用文献学的系统方法对一部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整理与研究，然后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地根据这部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而丰富的史料内容进行专题性的研究，从而使历史文献学与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才能使历史文献学不辜负“历史”二字。在我看来，历史文献学不是单单研究“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根据“文献”来研究“历史”。这应该是“历史文献学”这一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发展“历史文献学”的坦途。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这一研究，正是充分体现这一研究思路的成功之作。我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对他能够用多年的思考与功夫完成这样一部分量扎实而且在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可以说做出了突出成就的著作，感到无比欣慰。

以上只是简要地提到这部研究著作的一些特点，其实如果能够仔细而深入地阅读其中的内容，还会得到更多的收获。如其中对白莲教史料的挖掘与研究，对于明清史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相关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作者的研究不再是停留在一般性史料的分析与论证上，而是能够细心地从《夔州府志》中梳理出更多且更翔实的有关史料，从而把明清白莲教问题

的研究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个研究中，不仅涉及《夔州府志》这一部文献，而且还涉及清代更多的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其他文献。如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和《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二书，就是研究四川夔州与湖北、陕西三省接壤地区社会历史以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白莲教问题的重要文献。我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时，对严氏《三省边防备览》做了专门的研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的文献，在对这部历史文献所写的提要中，我认为：

严氏此书指出川、陕、鄂三省交界山区多有三楚、两粤、滇、黔流徙之民寄居其间，严氏在此地为官二十余年，道光元年（1821）曾亲自查勘三省边境，遍历各处，又有共事诸君久于其地，洞达边事，他遂综合相关资料，辑为《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该书内容以防范此地民众叛乱为主，所涉范围包括陕西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府，四川保宁府、绥定府、夔州府，湖北鄖阳府、宜昌府等地。全书分舆图、道路、水道、险要、民食、山货、军制、策略、史论、艺文十门。尤其是卷一舆图部分，有图14幅，包括川、陕、鄂边境总图、边境交界相连险要图、宁河南褒西乡定远图、安康平利紫阳旬阳白河图等。其中，险要图最为详细，标出各处险要，又附以文字说明。卷二、卷三道路考，记述此区陆路，以县为中心，记有详尽里数、所经地点、沿途险要之地及道路使用状况，不仅记录大路，又详记山间小路，殊为可贵。书中又附《额勒勇公行营日记》，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在嘉庆三年至七年间（1798—1802）往来川、陕、楚边境督剿路程日记，记载所行各处地名及所行里程，甚为详备，颇为难得。水道、险要两类则详记此区河流所经地方及各地险要之处，而民食、山货两类则详载其地水利、作物、物产、民众生活及木厂、盐厂、铁厂、纸厂等事，于人口移动亦有详细记述。又记山区通行清香、圆顿、太阳、天主、白莲教等事。军制类中又记述清军于此地剿灭民乱所用策略，有采哨略、山谷行营略、立表略、谨防略、整暇略、埋伏略、游兵略、安置伤兵略、腾营伏路略、得胜戒严略、受降备兵略等，与策略类所论用兵剿乱之事可以参见，皆为清军实际作战经验之总结。史论类，则搜集总结历代于此地用兵经验及其评论，亦颇详备。是书以三省边界为中心，不限一省一府一地，以防范民乱及山区用兵为主眼，所记皆所亲历，故其史料价值颇高。

由于我对此书有比较认真的阅读，因此在指导熊茂松博士论文其间，多次交谈中都曾提到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研究中早就充分认识到这部文献的重要性，并在研究中多次加以引用，从而使自己对《夔州府志》中的白莲教研究具有更为广泛而扎实的史料支撑。这种具有关联性的研究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有关专题，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熊茂松的这部著作终于能够正式出版了，这一方面是对他多年来用心读书和研究的鼓励，另一方面也用实际例证证明了我所认为的“历史文献学”必须从历史文献的丰富内容出发而上升到史学的专题研究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在撰写这篇小序时，我的内心是非常充实而快慰的。在此我要感谢他的辛苦努力，更希望他在今后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不断进取，更深入地挖掘重庆地区丰富的历史文献，为重庆地方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韶军

2017年11月22日

刘韶军，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



内容提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文献学理论对明清《夔州府志》做文献研究，下编以生态环境为视角做明清时期夔州地区的地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上编第一章考证了夔州行政区划的演变及夔州地方志的修纂源流，论述了明清《夔州府志》的修纂情况。明清两朝夔州府各自修纂《夔州府志》三部，今存明代一部，清代三部。清代《夔州府志》内容不断充实，体例不断完善，至道光《夔州府志》，体例上与清《一统志》基本一致，实现了为清《一统志》取材的目的。第二章论述清《一统志》的修纂带动了道光《夔州府志》等省府州县志的修纂，使得包括《夔州府志》在内的地方志高度成熟。承担明清《夔州府志》修纂任务的是地方知识分子，他们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承者，是地方志书写的主要力量。根据清代地方志修纂历史派和地理派的主要观点和行文风格，可以看出道光《夔州府志》体现出历史派的修志思想。道光《夔州府志》是清代府志高度成熟的代表之一，其体例完善，史料准确可靠，凸显地域特色，反映出清代志风的谨严。第三章论述明清《夔州府志》的史料来源及特色史料。明代地方志史料多来源于档案，清代地方志的史料来源多样化。明清《夔州府志》的金石史料极具文献价值。道光《夔州府志》中保存的白莲教起义史料、竹枝词史料、人物史料等为我们研究夔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课题，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下编第四章论述明清夔州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生态变迁情况。明初夔州地区



社会生产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持比较良好。明中后期之后，夔州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很大破坏，生态环境开始恶化。明末清初，夔州地区社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自然生态得到短暂恢复。清代前中期夔州及其附近地区得到深度开发，迁入了大量人口，以玉米为代表的高产农作物得以种植并推广，社会生产和生态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森林资源锐减，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而影响到土地的继续耕种和人口的变化。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用水一直是夔州地区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明代解决了夔州城内居民的用水，清代解决了城市的供水和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用水，明清夔州地区官方与民间都极为重视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五章论述夔州地区巫文化的产生不仅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而且还与历史上本地区绵延不断的人口迁徙汇聚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密切相关。夔州巫文化影响下的宗教观念意识展示的生态思想、行为活动体现的生态意识、生活习俗反映的生态关注饱含峡江先民独特的生态观念与生态思想。夔州地区众多的祈雨习俗反映出当地炎热的自然生态环境，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感应自然祈求降雨，并希望得到自然界的回应，满足人们的需求，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夔州地区的踏碛习俗反映了文化习俗作为一种社会传统，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人始终是传播文化习俗不可或缺的载体。第六章论述清代国家对夔州等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为白莲教的传播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环境，白莲教在清中期能够大量吸引夔州地区的群众参加，是当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失控引起的，也与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仍等因素密切相关。夔州地区在清代中期白莲教起义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寨堡，反映出清代中期夔州地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夔州地区乡勇和义民为抗击白莲教起义付出了巨大代价，暗示着维持清王朝政权的八旗兵战斗力大不如前，清王朝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弱化。

结语部分总结了明清《夔州府志》的发展变迁情况，其“不变”的地方主要在于编排体例上，这是明清时期国家层面的修志意识在基层社会的修志实践中得到贯彻的体现，显示出明清王朝在专制统治上的不可变更性，也说明了封建国家在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清代《夔州府志》的“变”主要表现在内容上更为充实完备，显示出清代地方志记载的内容更加详细化、具体化和专门化，在

体例上更符合国家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历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进行的。明清地方志对本地地图、山川、建制、沿革、物产、风俗、星野、津梁、水利、灾害、人口、物种、形胜、古迹、名景、城池、楼阁、艺文等内容的记载，为我们从生态环境的视角研究认识明清时期某一地区的地域社会文化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编

第一章 夔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及夔州方志的修纂源流	21
第一节 夔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	21
第二节 夔州方志的修纂源流	32
第三节 清《一统志》《四川通志》的编修与清代《夔州府志》的修纂	43
第二章 明清《夔州府志》修纂研究	55
第一节 明清《夔州府志》的修纂人员	55
第二节 道光《夔州府志》的修志思想	63
第三节 道光《夔州府志》的修纂评价	75
第三章 明清《夔州府志》史料研究	85
第一节 明清《夔州府志》的史料来源	85
第二节 明清《夔州府志》金石史料研究	99
第三节 明清《夔州府志》的特色史料	108

下 编

第四章 明清时期夔州地区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124
第一节 明代夔州地区社会与生态变迁	124
第二节 清代前中期夔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开发与玉米种植	132
第三节 明清时期夔州地区的水利建设	145
第五章 夔州地区文化习俗研究	160
第一节 夔州地区巫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160
第二节 干旱气候条件下夔州地区的祈雨习俗	168
第三节 历史传承与自然结合下的夔州踏碛习俗	175

第六章 清代夔州地区政治与社会生态失衡下的白莲教起义研究·····	186
第一节 清中期夔州地区政治与社会生态失衡下的白莲教传播 / 186	
第二节 清代夔州地区白莲教起义中的寨堡 / 195	
第三节 清代夔州地区白莲教起义中的乡勇与义民 / 208	
结 语·····	219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2

绪 论





一、研究情况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 研究明清《夔州府志》，可以为我们认识明清时期府一级地方志的体例、内容和修纂活动等提供一个样本

中国地方志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及至明清时期，府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修纂了大量的地方志书。明清府志的修纂时间长达五百余年，经历了不断地发展演变，需要归纳总结，而且全国各府基本上都修纂有府志，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具有研究的对象资料。明清时期，国家多次纂修《一统志》，省级政府因应纂修通志，府州县政府也密切配合国家的修志活动，因此，各地府州县志的纂修与国家的修志形成了互动的关系。在修志实践活动中，一些有影响的方志学家总结出比较成熟的修志理论和修志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对地方志的修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明清《夔州府志》对之加深认识。中国目前现存的地方志书总数达到八千多种，这些方志中的大量史料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探讨，有些极具文献价值，也有一些史料陈陈相因，越到后代，堆积越多，需要加以对比研究，析其源流，辨其真伪，考其来源，比较其价值。作为府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明清所修府志要为国家的《一统志》和省的通志做材料准备，对于诸如《夔州府志》等府志的史料很有研究的必要。清代是我国有史以来修志最为繁盛的时期，各级地方政府都组织了机构和人员专门修志，这涉及地方志书的纂修过程及其机构人员、体例、内容、史料来源等诸多方面，需要进行梳理，找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为人们了解清代府一级地方机构修

志的情况，为今后的修志活动提供参考与借鉴。目前基本上没有学者对这一特定的文献修纂活动做专门的研究，研究明清《夔州府志》可以为我们认识明清时期府志的修志活动提供参照。

2. 研究明清《夔州府志》，可以为我们认识自古以来地方志特别是府志的发展演变提供翔实和完备的个案

府作为明清时期的介于省和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存在了近550年的时间，在这550年中，历代知府组织修纂了多部府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已经散佚了。夔州府基本上涵盖了三峡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的三峡地区由于山高水深，沟谷纵横，丛林密布，开发比较晚，经济文化落后，直到唐朝还是流寓之地，如宋申锡、韦处厚、刘禹锡、杜甫、白居易等都曾在三峡地区留下足迹。也正是从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度移驻四川，三峡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使得本地区逐渐得到开发，记录三峡地区的地方文献也逐渐增加。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笔者统计出唐宋时期夔州地区的图经和志书计有22种，但所有这些图经和志书都已散佚无存。元朝复置夔州路，地方志书较少，据笔者考证，终元一代，夔州府仅有王伯庠《夔州图经》一部，也已经失传。明代政府大规模编修全国区域志是在景泰、天顺年间，这使得府州县志的编纂在明朝十分繁盛。但遗憾的是，夔州地区大量的明代方志经过明末的兵燹之后，保存下来的极为稀少，整个四川流传下来的府志仅有六部，明代正德年间的《夔州府志》在经过明末清初川东地区“十三家”抗清的大规模战争破坏后，得以流传下来。根据《中国地方志集成》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核查，修于明正德八年（1513）的《夔州府志》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原川东地区的地方志，但该志书内容比较简略，而且其中还有错乱之处。到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夔州府又两次重修府志，但都沿袭旧作，由于时间较早，体例不精，内容不足，受到学者的关注也较少。道光年间所修《夔州府志》在原有几部府志的基础上，结合夔州府在清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新确定了修志体例，增加了原志书十分之四的内容。新本《夔州府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夔州府在清朝建立180年后的社会全貌，自此以后，夔州府再也没有新修方志了，所以此本府志是夔州府志中最为完备和详尽的一部历史文献。将夔州方志及《夔州府志》串联起来考察，考究其源流，可以清楚地认识中国地方志特别是府志发展演变的情况，从而为我们认识地方志特别是府志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比较完备的个案。

3. 研究明清《夔州府志》，可以为我国研究夔州地区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史提供文献支撑

近三十年来，不管是国际史学界还是国内史学界，都掀起了研究地域社会史的热潮，各种地域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地域社会史研究以一个崭新的研究角度呈现在学术界，在这个新的史学研究视野中，地方志既是历史研究的史料，又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我国传统史学中，早期的研究不重视地方志史料的应用，进入20世纪以来的史学研究，地方志多被视作一种史料，用以重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分析社会历史变迁，考察地域社会历史事件等。如今学术界已经开始对方志本身进行研究，有的研究方志的修纂源流，有的研究方志的文献价值，有的借助方志的修纂研究地域社会的控制等。在社会文化史、生态环境史等学术视野下，对地方志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学术视野，各种地方志已经被视作一种记载地方历史的“文本”，研究者通过对其进行考察，揭示其中暗含的国家、地方社会的权力、观念、目的和意义，而且很多学者利用地方志的文献史料构建地域社会某一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以及在此环境基础上的人的历史活动。这种通过梳理和述评地方志的相关内容，从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的角度研究地方志，进一步拓宽了地方志研究的途径，使得地方志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夔州府志》作为三峡地区明清时期官修的地方志，既汇集了历代本地所修图经、方志的内容，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不断丰富完备本地的地理人文、经济社会、文化遗存等文献史料，我们根据这些史料，完全能够以生态环境史的视角去研究认识夔州地区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变迁情况，去研究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开发、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变迁、自然灾害影响等。明清《夔州府志》可为这种地域社会史研究提供文献支撑。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 对中国方志和方志学研究的回顾

对于方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经历了地记、图经、地志、方志等几个阶段，对此大部分学者还是比较认同的。到了南宋后期，方志逐渐定型，名称也趋于固定。从明代开始，中国地方志进入全面成熟时期，方志学家大多直接参与了修志实践活动，提出了大量的方志学理论，其理论不断发展，使得明清时期我国方志事业极为繁盛，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在经过了唐、宋、元代历朝对地方志的

理论探索后,明清时期的方志学家在探索地方志的理论上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例如,很多修志专家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地方志的修纂以及与史学传信的关系。

“志之成,所以纪实也,若人若事,详略直书而备载,不以爱憎文饬以枉其实”¹,“作志……必备,必精,必信”²,都强调了可信度是修志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夔州府志》对于修志必须征信也有详细的论说,“且求之博,莫厌其繁,但毋虚毋浮,毋至失实,有味公道”,“往者有所传,来者有所述,成此盛美,用以传信也”³,编修者强调要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做到不虚浮,不失实,不与公道相背离,用以传信后人。又如对于地方志与史学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清代章学诚为一代方志大家,曾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⁴章学诚强调方志就是地方史,对于章学诚的修志思想,后面还会专门论述,此处不多讲。章学诚的修志理论是我国方志修纂理论成熟的标志,但真正提出“方志学”这个名称的要数清末民初的梁启超。梁启超对章学诚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以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⁵梁启超在方志学上的成就也很大,得到后来学者们的一致认同。“章学诚是个史学家,他对方志学的贡献虽大,并未跳出史学的圈子,所以,他将方志学归诸史学。至于方志学一说,笔者所见最早出自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此时已是民国时期……其实梁启超虽提出方志学一说,但他也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学’,又说‘史之缩本,则地志也’,亦未出史学范畴。近代有些学者开始以方志学为一门独立学问进行专门研究。”⁶章学诚认为方志等同于历代正史,充分肯定了方志的价值,但他对方志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并没有系统地建

1 [明]张奎修,夏有文纂:《金山卫志》,张奎后序,明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

2 [明]马性鲁纂修:《顺昌县志》,马性鲁序,明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

3 [明]吴潜纂修:《夔州府志》,吴潜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4 [清]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下册)方志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5页。

6 张其昀:《缘起》,《地理杂志》第2卷第4期,1929年,第2页。